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研究方法－小組報告》

2025 年 6 月

不同世代的物質主義傾向：
相對剝奪感的調節角色－以三鶯地區為例

第六組

林國生、吳念璞、陳映潔、林彥函

黃詩淇、廖昱翔、伍嘉怡、林信真、婁諾謙

目錄

壹、 研究背景.....	1
一、 背景與動機.....	1
二、 研究問題.....	2
貳、 文獻回顧.....	2
一、 物質主義傾向.....	2
二、 世代.....	3
三、 相對剝奪感.....	4
參、 研究架構及假設.....	4
肆、 研究方法.....	6
一、 資料.....	6
二、 測量.....	6
伍、 研究結果.....	10
一、 描述統計.....	10
二、 迴歸分析.....	13
陸、 結論.....	15
一、 討論.....	15
二、 研究限制.....	16
柒、 參考文獻.....	16

壹、研究背景

一、背景與動機

臺灣已經在 90 至 00 年代的經濟、生產結構轉型之中進入後工業社會（林宗弘，2009）。後工業社會使得重工、化工、製造業等產業轉型成為以第三級產業（即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部門，製造業的產業比例逐漸下降，傳統的工業製造業逐漸萎縮，取而代之的是以專業技能、創新和資訊處理為主的工作。勞動市場的需求更偏向於高技能的專業人士，如工程師、醫療人員、教育工作者和資訊技術專家等。這也導致了教育與技能培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並使得知識和創意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後工業社會的發展也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化。

隨著工業化的進程放緩，社會的焦點逐漸轉向生活品質、環境保護、文化多元與社會民主等非物質層面的需求。Inglehart（1977）指出社會在經過物質變得充裕並且知識水平提升到一個程度的時候，人們的生活焦點逐漸從追求物質財富的物質主義轉向追求精神層面的滿足和自我實現的後物質主義。雖然台灣已經轉型成後工業社會，而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已經達相當水準並在 2022 年成為全球第 21 大經濟體，超越瑞士、南韓等國，但台灣仍然有較高的物質主義傾向。而蔡明璋（2018；2024）指出台灣有較高的物質主義傾向，以及因為分配不平等以及台灣的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使經濟成長並無使臺灣整體社會感到基本需求的滿足，故此不符合 Inglehart 的理論中後物質主義轉型的趨勢。

為了能找出相對剝奪感程度與個體的物質/後物質主義傾向之間的影響和關係，相對剝奪感將會作為本研究的測量標的。在 Kim 等人（2017）所做的心理學研究顯示出較高的相對剝奪感與更高的物質主義相關。透過文獻的支持我們決定以相對剝奪感作為測量標的幫助研究的進行。另外，在盧春龍（2014）的研究中也能夠發現時代差異對於物質/後物質主義傾向有所影響。也由於台灣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可能會在世代方面調節相對剝奪感對於物質/後物質主義傾向形成，而我們認為不同世代對於相對剝奪感的認知以及其認為的程度形成不同的物質/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去傾向，故此時代差異也會作為另外一個測量標的來輔助研究的進行。

二、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 (一) 相對剝奪感程度是否會影響個體的物質主義傾向？
- (二) 不同世代是否會影響相對剝奪感與物質主義傾向？
- (三) 相對剝奪感是否會調節不同世代與物質主義之間的關係？

貳、文獻回顧

一、物質主義傾向

物質與後物質主義最早由政治學家 Ronald Inglehart (1970) 提出，主要探討不同社會群體對價值觀的變遷。Mukerji, C (1983) 提出物質主義為一種視金錢財物為人生中心的價值觀，認為世俗錢財才是生命中重要的一切，意即物質主義者的生活目標是獲取無數的物質利益，對於社會其他事情則興趣缺缺。他們主要強調經濟、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就業機會等等，物質主義的人們更關注基本生存需求的滿足。黃琮晟(2018)指出物質主義可以說是一種把生命重心、生活目標、時間精力建立在物質錢財的人生價值觀，並利用金錢來展現自我的價值觀。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繁榮，部分群體的基本物質需求已經獲得滿足，他們的價值觀便會轉向非物質性的需求，如個人自由、自我實現、人權保障、環境保護、民主參與等等。李立峯(2013)提出政治社會化是其中一個讓年輕世代接觸民主、自由、公義等後物質主義的公民價值。Inglehart (1990; 1997) 提出後工業社會民眾的教育與技術升級，使其生活水準提升到溫飽之上，在物質安全感到保障之後，使得傳統強調物質生存的價值逐漸轉變為後物質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越富裕的國家或一個社會相對於富裕的中產階級民眾，整體平均將有更強的後物質主義傾向。Inglehart (1990) 指出年輕世代對後物質主義價值的興起扮演了至為重要的角色。

而在過往中大多數研究已經有確定會影響後物質／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因素，分別王美慧(2006)指出過往會影響物質/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因素為性別、父親教育程度、家庭社經地位、居住地區、修讀學科、就讀年級、權威性人格、個人現代性。Abramson, Ellis 以及 Inglehart (1997) 的研究指出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對個人價值觀均有影響，當通貨膨脹率降低時，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民眾比例會相對增加。雖然過去有研究已指出世代會影響個人物質主義傾向，但我們的研究會加入相對剝奪感作為調節變項，探討相對剝奪感是否會影響不同時代與物質主義之間的關係。台灣的社會價值處於新舊文化並行的狀態，物質主義是

目前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普遍現象，金錢至上、消費習慣改變之現象代表了物質主義在台灣社會文化中的展現（林耀南，2012）。已有研究顯示，消費習慣與物質主義傾向有緊密的關聯，備物質主義人格的人們習慣用物品來證明自身的成功。其研究證明，Y、Z 兩世代因追求物慾、受社群媒體影響，更需要物質上的滿足，進而產生炫耀性消費（黃姿瑜，2016）。

二、世代

每個世代都有其獨特性，在物質主義中的傾向亦如此。上述提及台灣研究發現 Y、Z 世代可能受到社群媒體提高了物慾外，Jean M. Twenge 與 Tim Kasser 提出，美國青少年物質主義在代間有上升趨勢，且 X 世代末至 Y 世代出達到高峰便維持在高水準，廣告對青少年物質主義傾向影響較大，且社會的不穩定性與物質主義增加有關。

盧春龍（2014）提及在中國十七個城市的研究中發現，「世代」作為測量物質主義或後物質主義傾向的因素，結果基於年輕世代生存在經濟較穩定的時代，較少受到生存焦慮影響，因此比起年長世代更容易接受後物質主義的想法。在大環境走向經濟相對穩定、沒壓力，以及傾向後物質主義的同時，某些地區的工作穩定性下降，尤其是美國，導致年輕一代更加重視薪水與就業保障，即使大環境呈現如此，仍會在不同區域有所不同。對此部分，台灣已有研究顯示「中老年和老年重視賺錢，年輕人注重理想」的表面刻板印象從調查數據來看不成立。即使經濟水準上升，基於分配不均的問題，人們仍對金錢相當執著（蔡明璋，2024）。同時，缺乏工會保護利益、產業與地域發展不均，在如此相互比較的環境下，相對剝奪感是否調節世代對於物質主義傾向程度是可探討的因素。

除此之外，台灣的產業轉型也是重要切入探討之重點。林宗弘（2009）提及，取 1992 年至 2007 年間為框架，這段期間台灣經歷了產業轉型與資本外移等重大變化，加工出口等中小型企業不復以往繁榮，專業技術人員擴張，「黑手變頭家」的現象逐漸消失，階級流動越來越依賴文化資本代際傳遞。總結以上得知，物質主義傾向很有可能因世代間的經濟、媒體與社群媒體發展不同而產生差異。

普遍認為的世代劃法不外乎戰後嬰兒潮、X 世代、Y 世代、Z 世代以及 Alpha 世代，在 Kotler, Sentiawan, & Kartajaya（2021）等人觀察發現，Y 世代更加重視體驗、感受本身而非所有權，且會直接影響 Z、Alpha 世代甚至 X 世代的觀念，Y 世代逐漸出現後物質主義的特性。在台灣，Y 世代出生時期對應著台灣經濟起飛的時期，科學工業園區的興起，專業人員擴張，汽車等家電普及率也上升，顯示人們越來越願意消費提高生活品質。建立這些資料，我們以 Y 世代為界線劃分

年輕世代與年長世代的界線。

三、相對剝奪感

相對剝奪感指的是在社會參考團體比較之下，主觀感受到自身處於不利地位，進而產生憤怒、焦慮等負面心理狀態，並影響其行為、價值觀等等（Smith et al., 2011；Smith & Huo 2014）。

在比較對象方面，使人們產生相對剝奪感的對象分成群體與個體。群體性相對剝奪感指的是一群人與其他群體比較之下感覺到被剝奪，Walker and Mann(1987)的研究有寫到這較多用於預測集體行動，例如集體抗爭。而個體性相對剝奪感是以個體為單位，指的是個人與群體內或外的他人比較之下感到被剝奪，在 Walker and Mann（1987）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個體性的相對剝奪感更能預測個人的生活水準跟心理困擾滿意度，在 Crosby（1976）的文獻中也有提及個人相對剝奪感相較群體相對剝奪感會與個人的幸福感有更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選擇採用個人相對剝奪感作為調節變相，而非群體性的相對剝奪感。

而在一篇研究相對剝奪感的文獻中，發現相對剝奪感有代間傳承的現象，代表在同一個家庭、不同世代的成員中可能有相對剝奪感程度相似的情形（Zheli, Fengqiang, Yuci, Hongxiu, Jinzhe, Lei and Jing, 2021）。因此，在傳承於家庭的相對剝奪感影響之下，世代和後物質主義傾向之間的關係可能有所不同。此外，如前述所述，年輕世代是因較少受到生存壓力的影響而容易接受後物質主義（盧春龍，2014），然而，相對剝奪感作為一個主觀的經驗（Smith & Huo, 2014），可以代表著在目前的生存壓力之下，所產生世代中的不同個人主觀情緒反應，進而影響世代對後物質主義的關係。

參、研究架構及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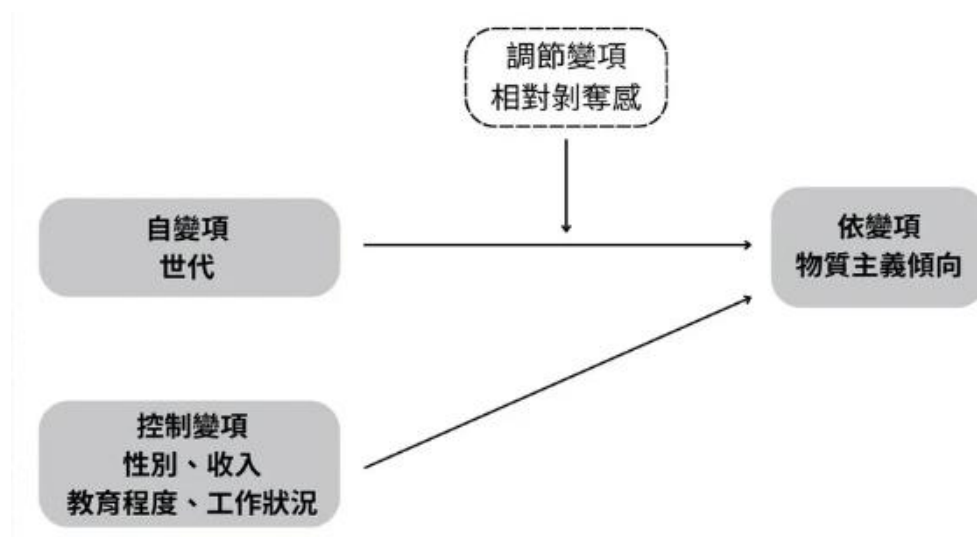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世代對物質主義傾向的差異，並進一步分析相對剝奪感是否會對世代與物質主義傾向之間的關係產生調節作用。研究的主要自變項為「世代」，依變項為「物質主義傾向」，調節變項為「相對剝奪感」，並控制性別、教育程度、收入及工作狀況等背景變項，以降低外部變因干擾。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世代劃分為嬰兒潮世代、X 世代、Y 世代與 Z 世代，作為自變項（X）；物質主義傾向則作為依變項（Y），並細分為整體傾向、成功面向與幸福面向，以更細緻地捕捉價值觀的不同層面。調節變項為「相對剝奪感」，意指個體主觀上對自身資源與他人比較後所感受到的不公平與剝奪感，旨在分析其是否會改變世代與物質主義傾向間的關聯性。此外，考量個人背景可能對價值

觀產生影響，故本研究納入性別、教育程度、收入與工作狀況作為控制變項。

本研究建構一個包含主效應與交互作用的模型，期望能釐清不同世代與相對剝奪感如何共同影響物質主義傾向的變異，進而為理解代際價值觀差異提供實證依據。研究架構圖如圖一所示：

圖一 研究架構圖



基於前述研究架構與理論基礎，提出四項主要研究假設。首先，針對世代差異與物質主義傾向的關係，提出兩個方向性的假設：一方面，假設隨著年齡增長，世代在物質主義傾向上會呈現遞增的趨勢，亦即越年長的世代，其物質主義傾向越高 (H1a)；另一方面，也提出相反方向的假設，認為越年輕的世代對物質主義的認同可能更為強烈 (H1b)。這兩項相對立的假設，旨在透過實證資料加以比較，判斷實際情況較接近哪一種敘述。

其次，研究預期個體的相對剝奪感與其物質主義傾向之間存在正向關聯，即個體主觀感受到的相對剝奪感越高，其物質主義傾向越強 (H2)。

最後，為進一步探究相對剝奪感在世代與物質主義傾向間可能扮演的角色，本研究提出第四項假設：相對剝奪感將調節世代對物質主義傾向的影響 (H3)。亦即，在相同的相對剝奪感水準下，不同世代在物質主義傾向上的表現可能有所差異，此交互效果的驗證可進一步釐清代際價值差異的成因。

以上假設將透過量化問卷資料進行實證檢驗，期望能更全面地理解物質主義傾向的社會心理動力，並釐清代際間價值觀差異是否受到主觀社會感受的影響。

肆、研究方法

一、資料

(一) 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新北市三峽區、鶯歌區與樹林區南園里（簡稱三鶯樹地區）為研究範圍，探討不同世代的物質主義傾向與相對剝奪感之關聯。研究母體為居住於三鶯樹地區、年滿 18 歲以上的居民。為提高樣本的代表性與推論性，本研究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方式，首先依照三區的人口比例進行區層分配，其中，三峽區 54%、鶯歌區 41%、g 樹林區 5%，按此分配，三峽為 539 份、鶯歌 407 份、樹林 54 份，再依各里戶數進行系統抽樣，每隔若干戶抽取一位受訪者。

(二) 樣本建立

初始收回之總樣本數為 940 人，經前置資料檢查後，於主要研究變項中共發現 10 筆缺失值，其中包含物質主義題項中的 1 筆缺失資料，以及家庭月收入變項中的 9 筆缺失資料。為維持資料品質與一致性，研究團隊採取刪除法，將含有缺失資料的樣本予以排除，最終有效樣本數為 930 人。

(三) 樣本分布

本研究以世代作為自變項，故此人口統計變量為重要資料，根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統計數據顯示，三峽區及鶯歌區在民國 114 年 5 月的資料中，屬「戰後嬰兒潮」者約為 26%、「X 世代」約為 30%、「Y 世代」為 19%、「Z 世代」為 25%，而本研究的有效樣本中之人口分布依序約為 20%、29%、21%、30%，由此可知，戰後嬰兒潮與 Z 世代有部分差異，但整體而言大致按照母體樣本分布。

二、測量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物質主義程度」，自變項為「世代」，再把「相對剝奪感」作為調節變項，觀察是否會影響自變項和依變項的關係，此外，將受訪者之性別、教育年數、工作狀況及其家庭月收入設為控制變項。

(一) 依變項

本研究欲探討物質主義傾向，其測量基於 Richins(1992)所建構之經典量表，涵蓋三個子面向：成功 (Success)、中心性 (Centrality) 與幸福 (Happiness)。為了精簡問卷內容，我們分別從每一面向中各擇取四個題項，總計 12 題，採用 4

點式李克特量表，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並進行操作化依序編碼為 1 到 4，評估受訪者對物質價值的認同程度。三個面向可合併作整體分析，亦可拆解分析各子構面。

為了檢驗此題組之建構信度，我們以主成分分析法檢視關於物質主義測量的 12 個題項，如表一所示，發現共萃取出 3 個成分，但各因素題項之組合與文獻所區分之成功 (Success)、中心性 (Centrality) 與幸福 (Happiness) 不同，然而，整體的 Cronbach' s α 值高達 0.78，且所有題項刪除後的內部一致性皆仍高達 0.7 以上，因此我們選擇保留了所有的題目，將各部分題項經反向編碼後，形成物質主義傾向程度的指標，編碼範圍由最低 12 分至最高 48 分，愈高分代表愈傾向物質主義。

表一 物質主義因素分析

題項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 s α
物質主義傾向		
1. 我羨慕這些擁有名車、豪宅、名牌衣服的人。	0.62	
2. 我擁有的東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的生活狀態。	0.53	
3. 「物質上的擁有」是人生重要的成就之一。	0.73	
4. 如果能買得起更多的東西，我會更開心。	0.76	
5. 我所擁有的東西並不全部都是那麼重要。	0.7	
6. 我不太會去注意到別人擁有的物品。	0.63	
7. 我通常只買我需要的東西。	0.77	0.78
8. 我喜歡把錢花在不實用的東西上。	0.75	
9. 比起其他認識的人，我比較不在意物質上的東西。	0.66	
10. 我已經有了享受生活上真正需要的東西。	0.6	
11. 如果我擁有某些我沒有的東西，我的生活會過得更好。	0.68	
12. 因為買不起所有我想要的東西，我有時會感到煩惱。	0.65	

註：1. 本表之因素負荷量，係採最大變異法進行正交轉軸的結果。
2. 第 5、6、7、9、10 題為反向題。

(二) 自變項

本研究將「世代」作為核心自變項之一，以受訪者之出生年重新編碼為類別變項。具體編碼方式如下，將民國 53 年（含）以前者，編碼為「戰後嬰兒潮」，民國 54 年至 69 年編為「X 世代」，民國 70 至 79 年編為「Y 世代」，民國 80 年以後則編為「Z 世代」。

(三) 調節變項

測量相對剝奪感則採用 Callan、Shead 與 Olson (2011) 所發展之題組，該量表評估個體主觀感受到的不公平與社會剝奪感。研究沿用台灣已有文獻中的翻譯版本（廖培珊、王奕縈，2023），共包含 5 個題項，選項則使用 4 點式李克特量表，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並且操作化依序編碼為 1 到 4。

為了檢驗此題組之建構信度，將五個題項執行主成分分析法，如下表二所示，發現共萃取出 2 個成分，其中有三題皆在同一個成分中，僅第 2、4 題反應於另一個成分，且進一步檢視其內部一致性，獲得 Cronbach' s α 值為 0.575。然而，若將其刪除則可以提升內部一致性至 Cronbach' s α 值 0.8 左右，因此本研究將其刪除。剩餘的三個題項重新進行主成分分析後，皆可反映到單一主成分上，且各題項之負荷量介在 0.84 到 0.85 之間，後續以剩餘三個題項分數加總後，形成可用於分析的相對剝奪感指標，編碼範圍由最低 3 分至最高 12 分，愈高分代表其相對剝奪感愈高。

表二 相對剝奪感因素分析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刪除題項 2、4 之因 素負荷量)	Cronbach' s α (刪除題項 2、4 之 Cronbach' s α)
相對剝奪感		
1. 想想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把您擁有的跟他們擁有的相比較時，會讓您有被剝奪的感覺	0.84 (0.85)	0.575 (0.80)
2. 跟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相比，您覺得自己是受到特別待遇的	0.82	
3. 看到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看起來這麼富裕，您感到氣憤。	0.85 (0.85)	

4. 對於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把您擁有的跟他們擁有的相比較時，您發覺自己過得不錯。	0.85
5. 跟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相比，您對自己所擁有的感到不滿意。	0.83 (0.84)

註：1. 本表之因素負荷量，係採最大變異法進行正交轉軸的結果。

2. 第 2、4 題為反向題。

最後，為了避免相對剝奪感與其交互項之間產生高度共線性，我們做中心化處理，並執行 VIF 分析，顯示從原先部分超過 25 以上，到中心化後皆降為 5 以下之 VIF 值，提升模型估計的穩定性及其效度。

(四) 控制變項

為避免其他因素干擾世代與物質主義傾向的解釋力，本研究納入性別、教育年數、家庭月收入、工作狀況做為控制變項，其中：

1. 教育年數

將受測者教育程度重新編碼，轉換為連續變項之教育年數，類別對應年數為：「無（不識字）」編為 0，「自修（識字、私塾）」編為 3，「小學」編為 6，「國（初）中」編為 9，「初職」編為 8，「高中普通科」、「高中職業科」、「高職」以及「士官軍校」編為 12，「五專」、「二專」、「軍警專修班」及「軍警專科班」編為 14，「三專」及「空中行專」編為 15，「空中大學」、「軍警官學校」、「科技學院、科大」以及「大學」編為 16，「碩士」編為 18，最後是「博士」編為 22。

2. 家庭月收入

收入變項則以家庭月收入作分析，以萬元為單位取各組中間值，重新編碼成連續變數，「不到 1 萬元」編為 0.5，「1 萬元以上，不到 2 萬元」編為 1.5，「2 萬元以上，不到 3 萬元」編為 2.5，「3 萬元以上，不到 4 萬元」編為 3.5，「4 萬元以上，不到 5 萬元」編為 4.5，「5 萬元以上，不到 6 萬元」編為 5.5，「6 萬元以上，不到 7 萬元」編為 6.5，「7 萬元以上，不到 8 萬元」編為 7.5，「8 萬元以上，不到 9 萬元」編為 8.5，「9 萬元以上，不到 10 萬元」編為 9.5，「10 萬元以上，不到 15 萬元」編為 12.5，「15 萬元以上，不到 20 萬元」編為 17.5，「20 萬元以上，不到 30 萬元」編為 25，「30 萬元以上，不到 50 萬元」編為 40，「50 萬元以上，不到 100 萬元」編為 75，「100 萬元以上」

編為 100。

3. 工作狀況

將原有選項分為無工作、有全職工作、有兼職工作三類，為類別變項，選「全職工作」者編碼為「有全職工作」，選「兼職工作」者編碼為「有兼職工作」，「退休」、「家管」、「待業中」以及「學生」則合併編碼為「無工作」，此外，選擇「其他」者，依據其作答內容妥善編碼為以上三類。

伍、研究結果

一、描述統計

(一) 量表作答分布

1. 物質主義

表三 物質主義作答分布

物質主義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 我羨慕這些擁有名車、豪宅、名牌衣服的人。	18.3%	50.5%	28.0%	3.2%
2. 我擁有的東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的生活狀態。	2.8%	17.5%	71.7%	8.1%
3. 「物質上的擁有」是人生重要的成就之一。	7.9%	32.3%	47.6%	7.2%
4. 如果能買得起更多的東西，我會更開心。	5.6%	25.9%	55.1%	13.1%
5. 我所擁有的東西並不全部都是那麼重要。	7.9%	63.9%	24.2%	4.1%
6. 我不太會去注意到別人擁有的物品。	8.7%	61.1%	26.5%	3.6%
7. 我通常只買我需要的東西。	12.7%	59.3%	24.3%	3.7%
8. 我喜歡把錢花在不實用的東西上。	21.4%	54.6%	20.1%	3.8%
9. 比起其他認識的人，我比較不在意物質上的東西。	6.6%	61.0%	27.8%	4.6%
10. 我已經有了享受生活上真正需要的東西。	9.2%	68.9%	17.9%	4.1%
11. 如果我擁有某些我沒有的東西，我的生活會過得更好。	5.1%	34.2%	51.2%	9.5%
12. 因為買不起所有我想要的東西，我有時會感到煩惱。	14.2%	47.0%	33.9%	5.0%

2. 相對剝奪感

表四 相對剝奪感作答分布

相對剝奪感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 想想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把您擁有的跟他們擁有的相比較時，會讓您有被剝奪的感覺	14.6%	65.9%	17.3%	2.2%
2. 跟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相比，您覺得自己是受到特別待遇的	8.8%	61.5%	27.7%	2.0%
3. 看到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看起來這麼富裕，您感到氣憤。	23.0%	62.9%	11.8%	2.2%
4. 對於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把您擁有的跟他們擁有的相比較時，您發覺自己過得不錯。	3.7%	23.8%	65.3%	7.2%
5. 跟那些條件和您差不多的人相比，您對自己所擁有的感到不滿意。	15.0%	66.6%	16.6%	2.2%

(二) 單變項描述統計

以下為本研究個變項之描述性統計，有效樣本數為 930 人，分布情況如下表：

表五 變項分布情況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次數	標準差／ 百分比
自變項				
世代				
	戰後嬰兒潮		188	20.22%
	X 世代		268	28.82%
	Y 世代		196	21.08%
	Z 世代		278	29.89%
依變項				
物質主義傾向	45	14	28.53333	4.497992
調節變項				
相對剝奪感	5.913979	-3.086021	1.55E-08	1.621013
控制變項				

性別	男			481	51.72%
	女			449	48.28%
教育年數		22	0	13.76452	3.193007
家庭月收入		100	0.5	13.51505	18.10611
就業狀況	無工作			298	32.04%
	兼職工作			62	6.67%
	全職工作			570	61.29%

N=930

(一) 依變項

物質主義傾向，有效樣本中最大值為 45，即幾乎完全偏向物質主義，最小值為 14，即幾乎完全不偏向物質主義，平均數約為 28.53。

(二) 自變項

世代，屬戰後嬰兒潮者佔 20.22%，屬 X 世代者佔 28.82%，屬 Y 世代者佔 21.08%，屬 Z 世代者佔 29.89%，大致符合母體分布情況。

(三) 調節變項

相對剝奪感，本研究採用中心化後的相對剝奪感指數，在中心化之前的相對剝奪感指標平均數為 6.09，可以看出整體樣本的相對剝奪感偏低，此外，由最大值 5.91 及最小值-3.09 可以觀察到中心化之前的相對剝奪感最大值為 12、最小值為 3。

(四) 控制變項

1. **性別**，有效樣本中男性佔 51.72%，女性佔 48.28%，可發現有效樣本中男性略多於女性。
2. **教育年數**，有效樣本中最大值為 22 (博士)，最小值為 0 (無 (不識字))，平均數約為 13.76，介於「高職／士官軍校」與「五專／二專／軍警專修班／軍警專科班」之間。
3. **家庭月收入 (單位：萬元)**，有效樣本中最大值為 100，最小值為 0.5，平均數約為 13.52 萬元。
4. **工作狀況**，有效樣本中無工作者佔 32.04%，有兼職工作者佔 6.67%，有全職工作者佔 61.29%，可發現有效樣本中多為有全職工作者。

二、迴歸分析

表六 影響物質主義傾向之迴歸分析

	M1	M2	M3
世代 REF=戰後嬰兒潮			
X 世代	1.071** (0.362)	1.174** (0.406)	1.165** (0.406)
Y 世代	2.294*** (0.374)	2.426*** (0.468)	2.343*** (0.453)
Z 世代	4.172*** (0.386)	4.302*** (0.460)	4.260*** (0.459)
相對剝奪感	0.872*** (0.114)	0.867*** (0.113)	1.013*** (0.212)
交互項 REF=戰後嬰兒潮 # 相對剝奪感			
X 世代 # 相對剝奪感			0.0634 (0.306)
Y 世代 # 相對剝奪感			-0.804** (0.291)
Z 世代 # 相對剝奪感			-0.0252 (0.295)
性別 REF=生理男			
生理女		-0.0565 (0.0473)	-0.0515 (0.272)
教育年數		-0.00151 (0.0473)	0.00457 (0.0463)
家庭月收入		-0.00957 (0.00739)	-0.0104 (0.00759)
就業狀況 REF=無工作			
兼職工作		-0.0364 (0.559)	-0.0593 (0.558)
全職工作		-0.141 (0.373)	-0.128 (0.295)
Constant	26.54*** (0.256)	26,70*** (0.615)	26.64*** (0.606)
Observations	930	930	930
R ²	0.220	0.221	0.235
Adjusted R ²	0.216	0.214	0.225
+* p<0.05, ** p<0.01, ***p<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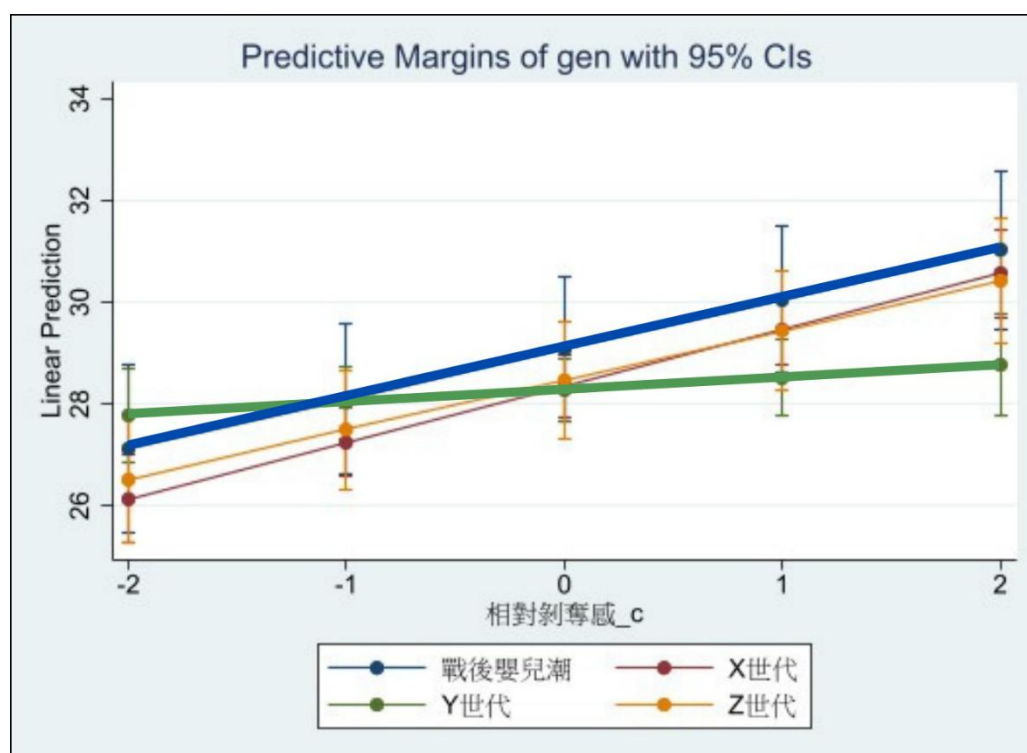
根據上表，在僅包含主要變項的模型一（M1）中可以看到，「X、Y、Z 世代跟戰後嬰兒潮的物質主義程度相比有顯著差異，並且越年輕的世代物質主義傾向越明顯」，以及「相對剝奪感程度高低對物質主義程度有顯著影響，並且相對剝奪感程度越高，物質主義程度就越高」。

再者，在加入控制變項的模型二（M2）中則可以看到「在不同性別、教育程度、收入和工作狀況之下，世代對物質主義程度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也代表著控制變項之效果皆並不顯著，以及「性別、教育程度、收入和工作狀況的差異對物質程度沒有顯著影響」。

最後，在放入所有主要變項、調節變項、控制變項的模型三（M3）中可以看到以下四個結果，分別是：

- （一）控制變項之效果皆依然並不顯著
- （二）性別、教育程度、收入和工作狀況的差異對物質程度依然沒有顯著影響
- （三）X 世代及 Z 世代跟戰後嬰兒潮相比，與相對剝奪感對物質主義程度的交互作用影響差異並不顯著
- （四）Y 世代跟戰後嬰兒潮相比，相對剝奪感程對物質主義程度的影響幅度有顯著差異（ $B=-0.804, P=0.006$ ），且相對剝奪感程度差 1 分，物質程度分數就差 0.8 分。換句話說，隨著相對剝奪感上升，Y 世代之物質主義上升幅度相比戰後嬰兒潮來的不明顯，而此調節作用之結果如下圖：

圖二 相對剝奪感及物質主義傾向線性圖



陸、結論

一、討論

本研究透過針對臺灣三鶯樹地區成年人口的調查資料，探討不同世代間物質主義傾向的差異，並深入分析相對剝奪感對此傾向的影響與調節效果。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越年輕的世代越傾向認同物質主義價值觀，尤其是 Z 世代明顯地呈現最高的物質主義傾向，而隨著世代的網上，認同物質主義的分數愈低。明確地支持了假設 H1b，與原本預設年長世代較高的假設（H1a）產生差異。這項發現呼應了當代臺灣社會消費主義的興起，再加上媒體的渲染和高度的資本化，所以年輕世代相對來說容易將物質財富與個人成就和快樂緊密連結。

而在另一方面，相對剝奪感在研究中也展現出穩定且顯著的正向效果，當個人感受自身在社會資源分配中處於劣勢或不公平狀態時，更容易透過物質上的追求以尋求心理補償的機制。這點再次驗證了社會比較理論的有效性，顯示個人在主觀感受到社會經濟落差後，傾向藉由提升物質財富的重視程度來調節、適應對於現狀的不滿足以及內在的失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當中戰後嬰兒潮、X、Z 世代在相對剝奪感與物質主義的交互作用當中都呈現正向的效果，但 Y 世代在相對剝奪感與物質主義的交互作用中呈現顯著負向效果。即當 Y 世代感受到較高程度的剝奪感時，反而降低對物質主義的認同。對此我們認為，Y 世代所處的生長環境，相較於之前的世代來說正在劇烈變動。全球化快速崛起及新自由主義的蔓延，再加上當時台灣社會環境與政策的調整，使得他們所面對的相較戰後嬰兒潮、X 世代所面對的社會環境更加嚴峻也更具挑戰，也使他們更難進行流動。所以在這樣的情境下，他們本身對於財富和成功等物質主義相關的概念就會比較強烈，而他們本身就處在無法超越前一個世代的陰影之中，因此加入相對剝奪感調節交互作用後，可能產生不顯著，甚至是負向的影響。另外，性別、收入、教育程度、工作狀況等變項的差異對於世代和物質主義的關聯沒有顯著效果。

總結來說，本研究描繪出台灣社會在世代之間價值觀上的明顯差異，以及相對剝奪感所扮演的重要心理機制角色，進一步了呈現社會不公平感知如何影響個人價值觀的形成。研究結論建議，未來在政策制定上應考量代間資源分配不均所帶來的心理與社會影響，透過公平性的提升，以降低年輕世代對物質的過度依賴。此外，未來研究可考慮進一步擴展研究範圍，包含更廣泛的人口樣本與跨地區比較，深入探索其他心理機制或社會結構因素如何形塑世代間的物質主義傾向差異，並協助相關政策更加有效地執行與解決世代間的問題。

二、研究限制

基於以上研究之發現，本研究仍存在著以下幾項限制，於解讀時宜加以考量。首先，本研究是以三峽、鶯歌、樹林南園里地區作為抽樣母體，樣本範圍具有地理上之侷限性，難以將研究結果推論至全國人口，故在推廣應用時需審慎評估其適用性，是否有更多地域性因素至此研究結果須進一步深入研究。其次，由於本研究性質上屬橫斷式研究設計，所分析的變項僅能揭示其間的相關性，一次性的抽樣研究無法進一步確認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未來研究可考慮採用實驗設計或縱貫研究以加強推論依據。此外，亦由於部分參考文獻為多年前之研究，其研究結果可能受當時社會背景、價值觀及年齡因素影響，所研究的對象，如 Y 世代等，雖稱謂相同，但可能與現今情境有所出入，進而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與時效性。

柒、參考文獻

- 王美慧 (2005)。我國大學生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之研究。
- 李立峯、鄧鍵一 (2013) 經濟發展，政治轉變，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電子版】。張少強、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張嘉輝 (主編)。香港：jcMotion。取自 <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 林宗弘 (2009)。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 社會不平等，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2009 年 12 月。
- 林宗弘 (2013)。失落的年代：臺灣民眾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人文即社會科學集刊。689-734。
- 林耀南 (2010)。消費者創新性、物質主義、消費者自信心與價格敏感度之關聯性研究。創造學刊，1(2)，97-118。
- 黃姿瑜 (2016)。流行涉入與物質主義對快時尚購買意願的影響(碩博士論文)。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U0023-1303201714242239>。
- 黃琮晟 (2018)。物質主義、強迫購買行為與幸福感之研究—以桃園市國中生為例。
- 廖培珊、王奕縈 (2023)。新冠疫情下的主觀福祉：社交距離及相對剝奪感的影響。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50)。123-162。
- 蔡明璋 (2018)。物質主義、後物質主義與新政治：世界價值觀第七波的臺灣調查與亞洲國家的比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特約研究計畫)。
- 蔡明璋 (2024)。臺灣人要理想，還是愛麵包？中研院蔡明璋解析從東亞到全球的「後物質主義」，人文·島嶼平臺，<https://humanityisland.nccu.edu.tw/ming->

chang-tsai/ ◦

盧春龍 (2014)。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中國的興起及其特徵：基於 17 個城市的調研資料。《中國行政評論》 20 卷 3 期 (2014/09) Pp. 27-45 ◦

Abramson, P. R., Ellis, S., and Ronald Inglehart (1997) ◦ “Research in context: measuring value change,” *Political Behavior* 19(1): 41– 59.

Callan, Mitchell J., N. Will Sheard, and James M. Olson, 2011,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Delay Discounting, and Gambl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5): 955– 973.

Heather J. Smith , Thomas F. Pettigrew, Gina M. Pippin, and Silvana Bialosiewicz(2012). Relative Deprivation: A Theoretical and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3) 203–232

Heather J. Smith and Yuen J. Huo(2014). Relative Deprivation: How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Inequality Influ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Health. *Policy Insights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4, Vol. 1(1) 231 –238

Inglehart(1977) ◦ The Silent Revolution ◦

Inglehart.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Jean M. Twenge and Tim Kasser. Generational Change in Materialism and Work Centrality, 1976-2007: Associations With Temporal Changes in Societal Insecurity and Materialistic Role Model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7). 883-897.

Kim, H., & Smith, R. H. (2017). Social comparison,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materi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6(2), 293-308

Kotler P., Sentiawan ., and Kartajaya H (2021). *Marketing 5.0: Technology for Humanity*. U.S.A : Wiley.

Marsha L. Richins.(1992).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3):303-16

Mukerji, C (1983). From graven image : Patterns of modern materialism

Strenze, (2021). Value change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rise of materialism, post-materialism or both?

Xuan , Fengqiang Gao , Yuci Zhou , Hongxiu Wang , Jinzhe Zhao , Lei Han , Jing Luo (202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